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China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

讨论稿系列
Working Paper Series

C2024005

2024-10-19

思想市场的条件

席天扬

引语

近年来，思想市场的概念频现于公共事务和经济问题的讨论。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把利益看作驱动人类行为和选择的主要动力，关于思想市场的论述认为：思想决定了人类行为和社会文化的演化形态，而思想又可以被外界力量所塑造和改变。理论、观念、信仰和对世界的认知通过书本、媒体、课堂等各种载体传播、交换，被人们广泛接受，形成了思想市场。在支持者看来，一个自由开放的思想市场对于经济繁荣和社会创新至关重要，而对于思想市场的限制则可能引起发展和创新的停滞。

然而，深入辨析不难发现思想市场概念的诸多模糊之处。首先，思想市场不像商品市场那样，拥有商品、价格、需求、供给等可以清晰定义的要素。因此，经济学中关于商品市场的逻辑分析和原则未必适用于思想市场。其次，从需求侧的角度，思想的现实影响力往往取决于社会潮流的发展趋势，而这种造就“英雄”的“时势”未必符合提出该思想者的本意、甚至在传播和实践中扭曲了思想者的本意。这就造成思想史上的一个吊诡现象：许多伟大的学者或思想者，往往也是遭受误

解（或声称遭受误解）最多的一群人。再次，从供给侧角度来说，学术理论的生产 and 传播不仅由市场规律所决定，还受到权力关系，特别是学术体系内部权力关系的支配。

本文撷取 20 世纪经济思想史的若干片段，对于思想市场这一概念的外延、内涵和现实相关性展开讨论。文章将首先回顾经济学家科斯在 1974 年论文中关于商品市场与思想市场关系的论述，揭示科斯针对思想市场监管的复杂态度。继而结合凯恩斯和哈耶克的经济思想的传播趋势，展示社会潮流和环境对于思想市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将通过案例分析，讨论学术思想的需求和供给因素、权力因素和组织衰退对于思想市场的影响。

思想市场的条件

席天扬¹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引语

近年来，思想市场的概念频现于公共事务和经济问题的讨论。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把利益看作驱动人类行为和选择的主要动力，关于思想市场的论述认为：思想决定了人类行为和社会文化的演化形态，而思想又可以被外界力量所塑造和改变。理论、观念、信仰和对世界的认知通过书本、媒体、课堂等各种载体传播、交换，被人们广泛接受，形成了思想市场。在支持者看来，一个自由开放的思想市场对于经济繁荣和社会创新至关重要，而对于思想市场的限制则可能引起发展和创新的停滞。

然而，深入辨析不难发现思想市场概念的诸多模糊之处。首先，思想市场不像商品市场那样，拥有商品、价格、需求、供给等可以清晰定义的要素。因此，经济学中关于商品市场的逻辑分析和原则未必适用于思想市场。其次，从需求侧的角度，思想的现实影响力往往取决于社会潮流的发展趋势，而这种造就“英雄”的“时势”未必符合提出该思想者的本意、甚至在传播和实践中扭曲了思想者的本意。这就造成思想史上的一个吊诡现象：许多伟大的学者或思想者，往往也是遭受误解（或声称遭受误解）最多的一群人。再次，从供给侧角度来说，学术理论的生产和传播不仅由市场规律所决定，还受到权力关系，特别是学术体系内部权力关系的支配。

本文撷取 20 世纪经济思想史的若干片段，对于思想市场这一概念的外延、内涵和现实相关性展开讨论。文章将首先回顾经济学家科斯在 1974 年论文中关于商品市场与思想市场关系的论述，揭示科斯针对思想市场监管的复杂态度。继

¹ 根据笔者 2024 年 5 月 13 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学术下午茶讲座”讲稿整理修改而成。感谢蒋俊彦、李井奎、李力行、刘松瑞、马浩、聂卓、韦森、伍晓鹰、徐远、姚洋、张丹丹、张维迎等评论，文责自负。

而结合凯恩斯和哈耶克的经济思想的传播趋势，展示社会潮流和环境对于思想市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将通过案例分析，讨论学术思想的需求和供给因素、权力因素和组织衰退对于思想市场的影响。

科斯和“思想市场”

思想市场的说法，通常追溯到经济学家科斯(Ronald Coase)的论文“商品市场和思想市场”²。这篇文章是科斯提交给 1974 年度全美经济年会法律经济学分会“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经济学”专场的会议论文，同场次参会论文还包括斯坦福大学法学教授巴斯特(William Baxter)提交的“规制和通讯媒体的多样性”³——二者都收录在当年《美国经济学会年会的 Papers and Proceedings 专辑》中。2013 年科斯和王宁合著的《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重申了思想市场对于处在经济转型中的中国的重要性，并把中国经济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归因于思想市场的薄弱⁴。

然而阅读科斯 1974 年的论文原文不难发现，与中文世界当中道德感充沛的叙事相比，科斯关于思想市场的原初论述更加克制和怀疑，对于所谓不受政府干预、自由竞争的思想市场的合宜性持批判态度。在文章开篇，科斯首先归纳了当时美国社会关于思想市场和商品市场规制的流行看法：“在商品市场中，政府监管是可取的，而在思想市场中，政府监管是不可取的并且应该被严格限制。”(p.384) 文章此后的大部分篇幅都在反驳这个命题。

比如，科斯认为，知识界有一种高估思想市场重要性、低估商品市场重要性的倾向；他针锋相对地提出：对于普罗大众而言，衣食住行等商品供给要比提供“正确思想”更重要。在他看来，规制商品市场和思想市场的悖论是：在一个市场被认为有害的政府干预却可能使得另一个市场获益。这个论述尽管表达得很含蓄，在战后资本主义民主社会的语境中，却不难洞悉其政策指向，即政府可以为了（更重要的）商品市场的发展而对某些思想进行限制。科斯写到，“当我们注意到，当下而言通常那些最强烈地要求扩大政府对其他市场的监管的人，也是最渴望大

² R. H. Coase. 1974. "The Market for Goods and the Market for Idea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64, No. 2, Papers and Proceedings, pp. 384-391

³ William Baxter. 1974. "Regulation and Diversity in Communications Media."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64, No. 2, Papers and Proceedings, pp. 392-399.

⁴ 科斯、王宁(著)，徐尧、李哲民(译)，2013，《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中信出版社。

力执行宪法第一修正案中涉及政府对思想市场监管的禁令时，这种悖论就变得更加引人注目。”（p.386）在战后七十年代美国社会现实中，支持规制商品市场和
支持媒体、言论自由的知识分子往往是同一批人，也就是俗称的自由派或者偏左
翼人士。科斯不无揶揄地暗示自由派以第一修正案的名义来反对规制思想市场是
搞双重标准：

“自尊使知识分子夸大了他们自己的市场的重要性。其他人应该受到监管似
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特别是当许多知识分子认为是他们自己进行监管。但是，
自利的动机(与自尊相结合)意味着(知识分子希望)在其他人受到监管时，监管不
应该落到他们头上。”(p.386)

如果考虑到科斯对于商品规制的一贯反感，以及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社会的
意识形态光谱，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论文中并没有一味赞颂不加限制的思想市
场。相反，这篇 8 页短文的核心逻辑是思想市场和商品市场的规制应该适用同一
种经济学逻辑，并强调了规制思想市场的合理性：“在制定公共政策时，我们应
对所有市场采用相同的方法。事实上，如果我们这样做，并将经济学家们对商品
市场所推崇的相同方法应用于思想市场，那么显然，政府干预思想市场的理由要
比干预商品市场的理由更充分。”(p.389)文章结尾处更直白地表明作者的政策取
向：

“当然，人们可以采取中间立场——政府既不像假设那样在一个市场中表现
得无能和卑鄙，也不像假设那样在另一个市场中高效和有德。在这种情况下，我
们应该减少政府对商品市场的监管，并可能希望增加政府对思想市场的干
预。”(p.390)

科斯在 1974 年论文中对于思想市场微妙的怀疑主义，以及他在 40 年之后与
王宁合著的《变革中国》中对于思想市场的充分肯定，无疑也构成了一种关于思
想的张力。如何理解这种差异呢？一种解释是，中美两国国情不同。1974 年的美
国社会，各种理论特别是左翼思潮尤为活跃。或许在科斯眼中，左翼思潮影响美
国的政策制定者，会形成不利于企业创新活动的监管政策。同样道理，或许在科
斯看来，束缚发展中国家的瓶颈是思想创新不足，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起点

不同，对于思想市场的需求也不同。然而，这个解释中关于中美社会的思想市场现状差异只是一种假设。事实上，中国国内对于经济政策也存在很多争论，对于竞争性的市场产生的影响也有很多来自左翼的批评。上述解释难以回答对于这类争论是否应该加以规制。

第二种解释是，科斯并没有主张限制思想市场，他是“正话反说”，通过反讽思想市场的负面效果来批判对于商品市场的过度干预，其真正理想是两个市场都保持自由开放。这个解释思路的问题是，按照科斯对于思想市场的定义，很难实现两个市场同时完全自由开放。一个自由开放的思想市场，总有可能形成强有力的左翼和政府干预经济的思潮，并转化为经济政策。智利 1970 年的阿连德政府，就是通过一人一票民主选举上台，以合乎宪法的形式推进包括国有化在内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依据科斯的论述，这是一个自由的思想市场造成商品市场过度规制的例子。

另一种可能解释是，科斯既没有主张要限制思想市场，也没有主张思想市场要绝对自由开放，他强调对于思想市场和商品市场的规制原则要遵循同一个经济学逻辑，至于对于二者的开放和限制到底如何才能恰如其分，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实际上，无论是商品市场还是思想市场，鲜有人主张彻底的自由放任或者完全由政府主导，各种争论的焦点恰好在于怎么认识具体问题。因此这个看似巧妙的回答其实是一个循环论证(tautology)，绕了一圈又回到了问题的起点。

以上讨论旨在表明，用自由放任的商品市场逻辑来类比思想市场，论证自由的思想市场一定导致促进经济转型和创新，可能是一种误读。科斯本人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偏向于务实主义(pragmatism)。除了经济逻辑之外，尚有很多基于哲学、道德和政治的理由支持思想市场的开放，但就经济领域本身而言，思想的自由竞争并不必然促进商品的自由竞争：至少在科斯看来，结果有可能适得其反。

二十世纪的思想“制高点”

与科斯相呼应，二十世纪许多伟大学者也赞同思想和理论是塑造政策和历史走向的重要因素。其中著名的论断，当属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结尾的表述：

“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们的思想，无论是对是错，都比一般所认为的更有

力量。实际上，统治这个世界的就是这些思想，而极少是其他什么。讲求实干的人，自以为可以完全不受智识力量所影响，实际却往往是某位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当权的狂人，听信的是无稽之谈，他们的那种狂暴行为，其根源往往出自几年前以前某一个不入流的作家的蹩脚之作。可以肯定，与思想之润物无声相比，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是被大大夸张了的。... 无论早晚，不管好坏，危险的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李井奎译）⁵

哈耶克在《货币国家主义与国际稳定》中表达了相似的看法：

“理论思考眼前的影响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它对于塑造决定着目前货币政策的这些观念曾发挥过深刻影响，这一点毋庸置疑...我确实相信，从长远看，人类的事务是受思想力量指引的。正是这种信念使我对这类思考给予高度重视，尽管这些思考对于眼前的事态所能产生的影响并不大。”（秋风译）⁶

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凯恩斯和哈耶克都极其推崇思想的作用，他们同时又在各种著作、文章和访谈中抱怨自己的思想和理论受到了大众误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也揭示了，凯恩斯和哈耶克的学术观点在同行中传播和被接受的方式与他们本人的期待相去甚远。

正如韦森教授在新著《重读凯恩斯》中所阐述的那样，从二战以后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来看，凯恩斯许多思想(包括货币内生、企业家预期、动物精神)并没有当时的主流理论框架吸纳。另一方面，其被主流经济所吸纳并数学模型化的理论并不为凯恩斯所赞同。可能正因如此，当希克斯(John Hicks)把关于 IS-LM 模型的文章寄给凯恩斯后，凯恩斯竟然在 6 个月后才回信说“我觉得这篇文章非常有意思，但就批评而言，我几乎真的无话可说。”⁷据称，晚年凯恩斯在参加了某个宏观经济研讨会后说“会上除了我，都是凯恩斯主义者”（梁小民，2024）⁸。

⁵ 凯恩斯(著)，李井奎(译)，2024，《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即出。

⁶ 艾伦·艾伯斯坦(著)，秋风(译)，2014，《哈耶克传：一位影响至今的经济学家》。中信出版集团。Alan Ebenstein (2001) Friedrich Hayek: A Biography.

⁷ 韦森(著)，2023，《重读凯恩斯》，上海三联书店；转引自 Skidelsky, Robert, 2003. John Maynard Keynes, London: Penguin Books. pp.548.

⁸ 梁小民，“回到凯恩斯本人理解凯恩斯主义”，《读书》2024年第4期。

相比凯恩斯，哈耶克在思想市场上的遭遇更为复杂。作为经济学家，哈耶克在职业生涯的前期致力于研究货币理论和资本理论，在就职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时发表了很多针对凯恩斯《货币论》的批评性论文。这一时期的论战某种程度上是策略性的，受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剑桥大学经济系，乃至莱昂内尔·罗宾斯和凯恩斯个人之间的学术权力竞争的影响。此后，哈耶克撰写《资本的纯理论》的计划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搁置，其货币和资本理论对于二战后主流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经济学文献发展的影响也较为有限。

从哈耶克任职于芝加哥大学的历程，我们可以窥见哈耶克作为经济学家的困境。一个例证是他的聘任来自于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而并非经济系。据该委员会主席约翰·内夫回忆：“经济系对社会思想委员会聘请他表示欢迎，但这些经济学家在 4 年前反对经济系聘请他，主要是因为他们觉得《通往奴役之路》太通俗了，不是令人尊敬的学者应该写的东西。经济学家觉得，只要不来经济系，让他到芝加哥大学，他们绝对没有意见。”(艾伯斯坦，2001, 2014, p.167)

芝加哥经济学的领袖弗里德曼表示：“我非常欣赏哈耶克，但不是欣赏他的经济学。我觉得《物价与生产》是一本漏洞百出的书。我觉得他的资本理论著作简直无法阅读。另外，《通往奴役之路》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书籍之一。... 我确实觉得，《通往奴役之路》让他找到了自己正确的天职——恰合自己的专业。”⁹ (艾伯斯坦，2001, 2014, p.77) 芝加哥经济系的另一位重量级学者哈伯格在 2021 年的访谈中承认哈耶克“与经济学系的人几乎没有任何交流。”(爱德华兹，2023, 2024, p.152)¹⁰

除了专业学术圈的误读和冷遇，大众媒体和公众人物也有意无意地把凯恩斯和哈耶克描述为在学术观点和政策取向上对立的两极。例如，有论者认为二战之后的经济学家分为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政府干预派和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市场派。这种看法可能是受到出版于 2002 年的著作《制高点：世界经济争夺战》以及根据该书制作的纪录片影响(Yergin and Stanislaw, 2002)。2015 年，英国广播公司(BBC)更是推出滑稽说唱剧“凯恩斯大战哈耶克”，由两位喜剧演员扮演凯恩斯和

⁹ 弗里德曼在访谈中否认了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拒绝聘请哈耶克的决定和《通向奴役之路》有关，他提出经济系决定的两个主要原因是：不希望被芝加哥大学校方指定聘用人选，以及对于哈耶克《物价与生产》及其资本理论的不满。参见艾伯斯坦(2014)，pp. 167.

¹⁰ 塞巴斯蒂安·爱德华兹(著)，郭金兴(译)，2024，《智利计划：芝加哥小子和新自由主义的兴衰》，中信出版集团，Sebastian Edwards (2023) *The Chile Project: The Story of the Chicago Boys and the Downfall of Neoliberal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哈耶克，用拳击比赛戏仿和虚构凯恩斯和哈耶克之间的世纪论战，并以哈耶克击倒凯恩斯，裁判却宣布凯恩斯获胜作为滑稽剧的结尾(韦森,2024)。

事实上，经济思想史的严肃研究和传记显示，哈耶克和凯恩斯不仅私交不错、相互尊重，他们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乃至经济理论上的共识可能远大于分歧。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在职业经济学家中间遭到冷遇，而凯恩斯是当时为数不多对这本书表示赞赏的学者（尽管对书中的政策批评有所保留）。尽管哈耶克和凯恩斯在货币理论和资本理论存在分歧，今天看来并没有超出学理争论的范畴。另一方面，哈耶克不乏对凯恩斯的赞誉和辩护，他评价《和约的经济后果》“这本文采斐然的书直言不讳，思想独立，(1920)”，“凯恩斯是一位对货币理论做出诸多真正贡献的金融天才(1976)”¹¹。

在政策取向上，凯恩斯和哈耶克有许多共识，都认可政府在当代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在 1945 年有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组织的电视辩论中，哈耶克表示不仅不反对社会保险、最低工资、最低收入等政策，甚至表示自己不反对恰当的产业政策，而他所举的例子是田纳西河谷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TVA)，一项由罗斯福新政设立的大型地方性经济规划和发展管理机构(Hayek, 1994,2023, p.)。

1965 年，弗里德曼在《时代》杂志的专栏文章中写到，“现在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了(We are all Keynsians now)”。这句话后来被尼克松引用来为其经济政策辩护。事实上许多在价值观上推崇古典自由主义和经济保守主义的政治家采取的政策具有凯恩斯主义特征。例如，里根在总统任期内经济政策以大幅度减税作为亮点，边际税率从 73%锐减到 28%，与此同时联邦政府支出特别是军费开支大幅增加，这也导致联邦政府赤字在两年之内从 1981 年占 GDP 的 2.46%攀升至 1983 年的占 GDP 的 5.71%，这是一种典型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小布什任总统时期的经济政策实际上延续了里根政府的模式：大幅减税和增加政府支出，在金融危机后政府赤字的 GDP 占比一度达到 9.75%。

我们可以利用谷歌公司的全球文本语料数据库(Ngram)，对于凯恩斯和哈耶克在英文世界中的相对影响力或者关注度做一个简单的量化比较。从下图中可以看出，在大部分时段里，英文世界中关于凯恩斯的热度(蓝色曲线)要高于关于哈

¹¹ 艾伦·艾伯斯坦(著)，秋风(译)，2014，《哈耶克传：一位影响至今的经济学家》，第 8 章。中信出版集团。Alan Ebenstein (2001) Friedrich Hayek: A Biography.

耶克的热度（红色曲线），但在进入 1980 年代之后，关于哈耶克的热度有了显著的、甚至可说是指数式的上升，这个变化和同一时期关于新自由主义的热度（绿色曲线）的增加同频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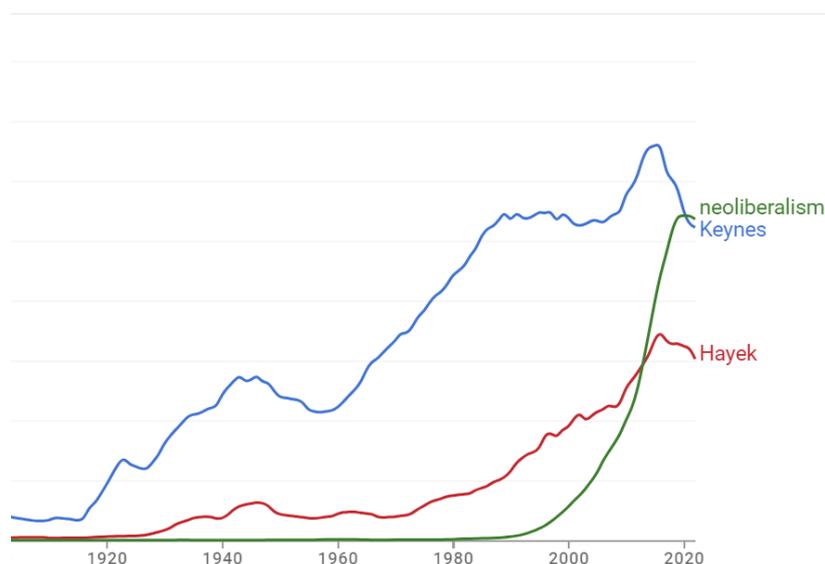


图 1：“凯恩斯”、“哈耶克”和“新自由主义”在英文著作中的词频(Google Ngram)

解析思想市场：供给和需求

上文讨论说明，即便诸如凯恩斯和哈耶克这样伟大学者，其思想在传播过程中也往往遭到误解和曲解。这种现象也提醒我们：形成思想市场的条件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简单，一个社会并不是免于行政外力的限制就能够形成充满活力和有效的思想市场。在思想的生产、传播和消费(被接受)和再传播的过程中，每一步都可能充满对于观念和信息的扭曲，这些扭曲既可能来自于思想的生产者，也可能来自于其消费者。

如果我们接受思想市场的概念，用市场经济来类比理解思想的生产 and 消费，在这个市场中的供给方，无疑是通过各种媒介进行写作和创作并试图影响和引导大众认识的思想生产者，比如学者、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等，而消费者则是思想生产者所提供的作品和观念的受众。这个概念似乎也可以推广到政治世界，特别是多元化竞争的选举制度中：比如，可以把不同的政党和政治家看作政见的生产者，竞选就是政治家向选民兜售关于政策或政见的思想，选民通过投票来购买这些思想；此外，政治家可以通过著作和媒体平台发表自己的观念，直接影响普罗大众。

然而,用商品市场的供需结构来还原思想市场毕竟只是一种类比。在现实中,有很多物理意义上的商品市场,但很难说有没有物理意义上的思想市场。我们进一步可以问:如果思想市场真实存在,思想供给方的目标是什么?是寻求真理还是最大化对自己思想的消费量——让尽可能多的受众接受自己的观念?

有一则著名的科学史轶事,说到在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后不久,一家德国报纸刊文“一百位德国物理学家声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错了。”据说,爱因斯坦对此回应“一个人就够了”(“If I were wrong, it would only take one.”)科学史上的很多次论战中,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甚至可以说,创新理论出现伊始,真理总是在少数人手中。然而如果把科学理论看作思想市场的商品,掌握真理并不足够。从科学真理转变为大众接受的常识,科学家(或者科学思想的供给者)面临着双重任务:首先是建立符合科学真理、更接近于揭示世界真实状态的命题;然后是让尽可能多的受众接受自己的命题(思想)。第一个目标在于认知。第二个目标在于实践;或者,从语言哲学的角度而言,在于推进语言哲学家奥斯丁所谓的行事性语句(performative utterance),从而达成某种成效。在这个过程中,科学思想供给方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迷信和狂热常常比真理容易赢得普罗大众的支持和认同。

政治学者蒋俊彦和温健民基于跨国的调查数据对于民主制度和大众的科学信仰进行了研究,并在《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发表了题为“民主与大众针对科学的怀疑”的研究论文¹²。他们发现:在全球低教育水平者中,生活在民主国家的居民对科学的信任感更低,非民主国家居民对科学信任感更高;而在全球高教育水平者中,民主国家居民对科学信任感更高。一个直观的解释是,科学观念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受众对于权威人士的话语权的认同,这种依赖在低教育水平人群中更为普遍。而在一人一票的平等观念深入人心的社群里,普罗大众更有可能转而寻求宗族、家长、宗教人士等韦伯所说的“传统型权威”,而非科学所代表的“理性化权威”。二十世纪以来,在动荡时代屡屡涌现的民粹主义思潮为这种解释提供了证据。

与此同时,科学思想和学术理论在传播过程中面临民粹化的伤害,也就是被传播者(同时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思想生产者)二次加工,以一种选择性和扭曲式呈现的方式,以经典作者的名义来宣传传播者个人的思想。

¹² Junyan Jiang and Kinman Wan (2023) “Democracy and Mass Skepticism of Science”, *World Politics*, 75(4), 735-778.

亚当·斯密的思想在二战后英文世界的传播堪称典型案例。今天，在美国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出现的亚当·斯密往往被视作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推崇者，其“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理论也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原则。而事实上，在《国富论》这本一千多页的巨著中，“看不见的手”这个词语只出现了一次，并且是为了批评当时英国的重商主义的政策。“看不见的手”隐喻所批判的对象，是商人集团以及赋予商人集团优惠政策而伤害农业(小)生产者的辉格党政治家。除此之外，《国富论》一以贯之强调政府的重要性，全书一半以上的篇幅(第 3-5 篇)用于论述政府事务，而非不受干预的市场。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对于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下了一个明确定义：

“政治经济学被视为政治或立法科学的一个分支，它提出两个不同的目标：第一，为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恰当地说，使他们能够为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其次，为国家或联邦提供足够的收入来支付公共服务。政治经济学的目标在于使得人民和国家都富裕。”¹³

用今天的话语来说，斯密对于市场经济的理解可谓“国进民也进”。那么，斯密又如何以经济的古典自由主义者面目出现于美国的经济学教育体系呢？根据华裔思想史学者 Glory Liu 在最新著作《亚当·斯密的美国：苏格兰哲学家如何成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偶像》中的研究，斯密的“美国化”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在 1950 年代编辑出版的一本《国富论》选读¹⁴。在选读本中，斯蒂格勒删除了大部分和“看不见的手”精神不符的段落。例如，斯密认为银行业从业者不受限制地追求自身利益可能造成极大社会危害，主张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管，这些段落被尽数删除¹⁵。

在学术思想被民粹化传播的过程中，学者也可能因为公众政治人物的推崇而受到更多关注。在 1945 年英国议会选举期间，当时的保守党党首丘吉尔大力推

¹³ Adam Smith (1776, 2003),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Book IV. “Introduction.” (pp.537) Bantam Classics.

¹⁴ Glory Liu. 2022. *Adam Smith's America: How a Scottish Philosopher Became an Icon of American Capital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¹⁵ 经济思想史和金融史文献表明，斯密支持加强银行业监管的态度与 1772 年在苏格兰爆发并席卷欧洲的艾尔银行危机(Ayr Banking Crisis)相关。这场银行业危机造成逾 20 家银行破产，斯密在私人通信中表示“至交中有几位深深卷入了。近来，我有很大一部分注意力集中在思考最体面的方法帮助他们摆脱困境上。”以上参见：赵博“苏格兰历史上最惨痛的银行破产案”，澎湃新闻 2021 年 1 月 29 日。以及 Tyler Beck Goodspeed. 2016. *Legislating Instability: Adam Smith, Free Banking, and the Financial Crisis of 1772*.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崇《通往奴役之路》，并藉此攻击竞争对手、工党领袖艾德礼，把工党形容为“某种形态的盖世太保。”艾德礼则回击丘吉尔的观念“在贩卖一位奥地利教授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的学术观点。”对此，哈耶克只能澄清道，“我听了丘吉尔先生的讲话，我唯一可以肯定的一件事是，他并没有读过我的书。”据分析丘吉尔对艾德礼的人身攻击是其输掉大选原因之一，其对于哈耶克的扭曲式推崇也难免损害哈耶克作为严肃学者和思想家的声誉¹⁶。

学术生产是一个权力体系

学术研究是一个小众的思想市场，知识生产也是一个权力体系。学术生产的精英化、小众化、科层化都决定了学术研究难以成为完全竞争市场。例如，已有研究发现，主流经济学顶级期刊的发表人集中在少数精英学校的经济系(Kocher and Sutter, 2001)¹⁷。顶级学术期刊的发表已经成为学术晋升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根据经济学家赫克曼及其合作者针对美国一流大学经济系的统计，当一名男性助理教授的经济学五大(top five)期刊上的发表数量为零，他在第一个聘期内取得终身教职的概率仅为 0.14，这个概率在他的五大期刊发表数为 1、2、3 时分别提升至 0.4、0.66 和 0.87¹⁸。在这个趋势下，追求五大期刊发表已经成为美国一流经济系青年教师的首要目标(Heckman and Moktan, 2020)¹⁹。与此同时，研究发现学者与顶级学术期刊编辑之间的社会联系(social tie)——包括学术指导、同学、同事以及合作经历和发表数量之间存在强相关性。在发表于顶级学术期刊上的论文中，43%被发现存在作者和期刊现任学术编辑之间存在社会联系(Colussi, 2018)²⁰。在这种情形下，顶尖精英大学的权威学者，往往也主导着学术议程乃至理论观点，形成对于思想生产的垄断。

是否存在防止学术思想市场垄断的办法？一个可参考的概念或许是经济学

¹⁶ 艾伦·艾伯斯坦(著)，秋风(译)，2014，《哈耶克传：一位影响至今的经济学家》，第 17 章。中信出版集团。Alan Ebenstein. 2001. *Friedrich Hayek: A Biography*.

¹⁷ Martin Kocher and Matthias Sutter. 2001. "The Institutional Concentration of Authors in Top Journals of Economics During the Last Two Decades." *The Economic Journal*. 111(472): 405-421.

¹⁸ 同时，赫克曼及合作者发现在期刊发表和取得终身教职概率上的性别差异。对于女性助理教授，五大期刊发表数为 0,1,2,3 时获得终身教职的概率分别为：0.14,0.34,0.4,0.69。亦有研究表明女性学者在合作研究中的贡献更容易被低估。

¹⁹ James Heckman and Sidharth Moktan. 2020. "Publishing and Promotion in Economics: The Tyranny of the Top Fiv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58(2): 419-70.

²⁰ Tommaso Colussi. 2018. "Social Ties in Academia: A Friend Is a Treasure."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00 (1): 45-50.

家鲍莫尔及其合作者在 1980 年代提出的可竞争性市场(contestable markets)。鲍莫尔等人提出，在垄断性的市场组织中，主要潜在的挑战者(新企业)能够平等地获取在位者的技术，市场中不存在企业进入和退出的人为壁垒，不存在由于沉没成本带来的规模经济，即便垄断或寡头的商品市场也能够实现接近竞争性市场的结果。这是因为，一旦垄断者偏离竞争性的价格，试图利用市场力量去获得额外的利润，都会被潜在的竞争者乘机进入抢走市场份额。

可以看出，可竞争性市场的成立需要依赖一系列条件，而从商品市场到思想市场的逻辑拓展更是存在诸多跳跃。在学术研究的思想市场中，可竞争性市场的第一个条件“技术的平等”是最容易实现的：随着网络的普及，对于科学方法的学习和前沿动态的掌握越来越容易。但是后两个条件：不存在进入壁垒和沉没成本，短时间内难以改变。事实上，学术思想市场的进入壁垒在于做学术工作首先需要获得相应的资格——比如至少需要获得博士学位，而获得博士学位的前提是系统接受主流学术理论和方法的训练，证明自己能够按照主流研究的理论观点和范式去做研究。而后学者一旦通过了已有学术体系的测试，思维方式和研究能力也会相应地固化，难以在后续的工作中对主流学术理论形成挑战，做出开创新的工作。因此，一个成熟的居于主导地位的学术流派，也往往面临着同质化发展和创新、变革乏力的挑战。所造成的结果，可能就像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描述的，科学范式的创新很难是渐进的，往往是颠覆性的革故鼎新。

退出机制和呼吁机制

《魔鬼经济学》作者列维特(Steven Levitt)在决定从芝加哥大学经济系退休后接受媒体访谈，提到弗里德曼不满于芝加哥学派价格理论范式的式微。另一位芝加哥经济系的领军人物 Casey Mulligan 调侃说“价格理论在思想市场上失利了”，并要求弗里德曼像接受市场竞争的法则那样坦然“面对现实。”在列维特看来，问题的吊诡之处在于弗里德曼作为市场经济的笃信者不接受芝加哥学派价格理论在思想市场竞争中走向衰落（如果不说是失败的话），而这种精神上的封闭对于一个学术流派的发展可能是致命的。

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有一句话，市场总是对的（或者：市场从不出错）。这句话的含义是，不必担心大多数被经济分析定义为外部性的现象，因为人们总是可

以选择用脚投票：在一个拥有选择自由的社会中，对于恶行最好的惩罚就是退出/不合作。从某种意义上说，列维特的退休也是从学术思想市场退出²¹。但是，这种论辩逻辑容易落入自身的话语陷阱。比如，弗里德曼以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批评而著名，在他看来，企业唯一的社会责任是增加利润，如果企业高管用企业的钱去做慈善，则是慷他人之慨，伤害了股东和消费者的利益。然而，德龙(Bradford DeLong)对此有一个极为精妙的反驳。德龙问，如果股东和消费者乐于见到企业行社会责任又当如何呢？德龙的逻辑是，我们或者相信存在自由选择，或者不相信存在自由选择。如果我们相信自由选择，只要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具有一定的竞争性，那么按照市场经济的逻辑，对于追求企业社会责任不满的消费者、劳动者和投资者就会用脚投票，停止消费、受雇和投资于该企业——按照这个推理，企业追求社会责任无疑是自杀式行为，自然也就不值一提。而如果竟然有人对于企业追求社会责任感到担忧和反感，这只能说明一件事情：他不相信自由选择。我并不完全同意德龙的结论，但是他的反驳至少揭示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主张在逻辑上的诸多偏颇之处。芝加哥学派的价格理论的兴衰，也说明了思想自由不是学术发展的唯一条件；如果仅有自由而失去创新的动能，学术组织就会变得保守、僵化、固步自封，乃至沦为党同伐异的工具。

学术组织如何避免向平庸和衰败滑落的命运？发展经济学家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出版于1970年的著作《退出、呼吁和忠诚》中给基于竞争的市场理论打了一块补丁。在赫希曼看来，已有理论把个人的退出(exit)作为保障市场效率的主要机制。比如，当企业不能保障员工的权益，员工可以选择离职；当消费者对于产品质量不满，可以选择更换消费品牌。但在现实中，许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从“合意的行为模式滑向衰败的倾向”难以避免，而许多市场的组织形态是垄断或者寡头型，没有合适的替代选项。在此情况下，组织内部对于变革的呼吁(voice)，促使“社会必须具备集结其内部力量的能力”就显得尤为珍贵和重要。

2024年9月

²¹ 在访谈中，列维特这样解释自己的退休决定：“对我来说，继续忙于做这些工作，花费数年时间写一些没人关心的论文，没有任何意义。而且我真正感兴趣的是其他地方。我对发表论文没有任何兴奋感。如果喜欢发表论文，如果喜欢在某些期刊上看到我的名字，那就不同了。但我从来不在乎那些。我只是喜欢解决问题，我意识到有更好的方式，有更好的渠道可以解决问题。”